

“拔剑。”杨青风站起身。

“拔剑!”罗文聪重复着。

“啊”,眨眼间,银白色的盲杖伸展开来,立在他们面前。

握紧杖柄,两人走出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综合楼五楼的一间教室。此时是2019年5月27日的傍晚,楼内很安静,盲杖点地后发出清脆的笃笃声,在走廊里一路回响。从这里出发,先天失明的杨青风要依靠他的“剑”,独自搭乘公交车回到远在30多公里外的家。

当天下午,“金盲杖视障奇葩成长营(北京站)”活动刚在这栋楼里结束。38岁的杨青风导师,比他小15岁的“徒弟”罗文聪是见习导师。

4天时间里,参加成长营的12名视障大学生,在志愿者的远距离保护下,以盲杖为“剑”,独立前往公园、超市等公共场所,完成相应闯关任务。

在此之前,这群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人几乎从不使用盲杖,更没有离开学校、家等熟悉空间单独出行的经历。

在我国1800多万名视障人士中,同样的现象非常普遍。



拿不起

5月24日下午1点多,开营时间快到了。楼林昊天匆匆走在去教室的路上,同行的同学陈瑾挽着他的胳膊。两人脚步轻快、自然,本应作为辅助工具的盲杖被折叠成短短一节,拿在手中。

很难看出,楼林昊天是一个眼睛没有一丝光感的全盲人。

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,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。有时为了赶时间,视障学生还会在校园里一阵小跑。

他们对这里实在太熟悉了。因为看不见,从入学开始,视障学生便在脑海中构建“记忆地图”,多生活一天,就多一分印象。开营第一天,有学生站在学校广场的中心,伸直手臂对杨青风说:“从这里直走到头是草丛,越过草丛是篮球场。从草丛向右转的路上有一个下水道井盖,经过井盖,左前方就是学生宿舍。”

在这里,使用盲杖才是稀罕事。成长营举办期间,一位视障学生戴着盲杖往返于宿舍和校门之间取外卖,被在教学楼前集合的营员们“听”个正着。有人小声说:“没想到还真有人在学校里用盲杖。”

同样的技能可以应用在任何他们熟悉的空间。到了周五,楼林昊天会按照脑中的地图从学校出发,走进附近的地铁站,搭乘地铁回家;周日下午再原路返回。两年来,他从没出过差错。

但楼林昊天和其他11位营员能做的,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一旦走出校园或偏离常规路线,他们就失去了这种“奇特”的能力。

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楼林昊天们不能熟练使用盲杖这一辅助工具。成长营的第一课,就从这里开始。

相比于杨青风那根有不少划痕的盲杖,营员们手中的金属杆都是崭新的。“除了以前在盲校学习使用盲杖外,这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盲杖出行。”音乐系大二学生李翔身高接近一米八,留着寸头,在队伍中很显眼。

第一项“实战”是探索校园。排好队后,李翔主动做起了领头的人。寻找盲道、穿越教学楼大厅、上下台阶……在熟悉的地方,李翔走得轻松。时不时地,他会悄悄拉高手柄,提着盲杖行走。

盲杖很轻,跟一本普通课本的重量差不多,但要拿起它,并不容易。“用上盲杖,就意味着别人知道我是盲人了。”探索结束后,李翔有些心虚地说,其他人重重地点头附和。

8岁前,李翔都能看到世界的样子。十多年来,他一直还在消化“自己失明了”这个事实。同样后天失明的肖菱给出的理由更直接,“盲杖会影响我的形象。”清瘦的女孩皮肤很白,有一张小巧的鹅蛋脸,说这句话时她下意识地点拨了一下自己柔顺的长发。即使眼睛没有光泽,肖菱依然称得上美丽。在她面前,再纤细的盲杖也显得很突兀。

对盲杖抗拒的背后,是对视障身份的否定与逃避。这一点,杨青风很清楚。“你们为什么来参加成长营?”开营那天,他提问道。

李翔是山西人,来北京上学后,他很想自己能回一次家;肖菱学针灸推拿专业,按学校要求大五在校外实习时需与搭档同时上下班,但她想要更自由的时间;楼林昊天的同学突发疾病住院,这让他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生了病,都无法独自去医院……

“还为了自由地恋爱!”一位营员的答案引起哄堂大笑。这让杨青风想起了多年前自己的“相亲”,是被双方家长“关”在屋子里完成的。“他们说这样才安全。”说着说着他自己也笑了,“如果那间屋子有窗户,他们恐怕会全程观看我们约会了。”

盲杖能带来选择,还能带来尊严。正如杨青风所说,实际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战胜了顾虑与恐惧,让这群年轻人决定尝试拿起盲杖。



不再藏

杨青风第一次独立出行,是偷着溜出去的。他在盲校上学时,学校规定,学生出入学校,必须有家长接送。父亲还老早就帮他想好了未来的规划:在家生活,由家人照顾。

成长营里的人都有类似经历。“外面很危险!”这是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大一学生戴彬倩去年曾报名“金盲杖”项目天津站的活动,接到入营通知后却遭到全家人反对,她的姥姥说:“你这样等于要了我的命!”

按比例计算,在我国,每80个人中就有一名视障人士。但在实际生活中,除了偶尔出现在路边的针灸推拿店,人们很少能看到视障者的身影。或是出于家



即使是坐着的时候,杨青风也“剑”不离手。

他们看不见世界,世界也“看不见”他们。因为无法独立出行,许多视障者的一生,大部分时间只在家与工作的针灸推拿店之间往返,有的甚至极少迈出家门。不过,总有人渴望突破黑暗。他们拿起盲杖,把它当做手臂、眼睛,当做行走时随身携带的“剑”,见自己、见天下、见众生。

仗“剑”走天涯

本报记者 张 千 杨兆敏



过马路时,陈瑾抬手向来往车辆示意。受访者供图

人的“好心”,或是出于自身的畏惧,大部分视障人士的一生,都是“藏”起来的。

在盲校念中专时,杨青风住校。一个周五下午,特别想家的他拿起盲杖,混在家长和学生中间出了校门,从西向东穿越北京城回到了家。同为导师的王志华更冒险。在外地求学期间,一次放假时他有意避开来接他的人,提前离校,随后独自连夜坐火车回到河北老家。

相比起来,罗文聪要谨慎得多。2016年,他的编程作品获奖,为了从青岛出发到北京领奖,他做了一份极其周密的出行计划,具体到每一个空间和区域的转换,最终成功带回了奖杯。那一次后,他把盲杖昵称为自己的“宝贝”,“太好用了!”

导师的故事讲得精彩,营员们却首先要习惯盲杖的存在。杨青风教的“两点法”很简单:迈右脚,盲杖移到身体左前方点地;迈左脚,盲杖移到身体右前方点地,如此往复。可刚开始,李翔的盲杖总是会“拐”到身体两侧,胡乱点上四五下,才能回到正道。李翔觉得,手持盲杖,自己好像反而不会走路了。

开营第二天,营员们要从学校步行到接近3公里外的目的地。一走出校园,陈瑾就用左手紧紧抓住衣服的下摆,显得很紧张。一路上,她的膝盖微微弯曲,身体往前倾,屁股向后坐,完全没有了走在学校里的轻盈。“这是典型的不太会用盲杖的走路姿势。”随行的工作人员说。

可陈瑾不敢扔了盲杖,这是她手臂的延伸,是她的“眼睛”。后来去商场完成任务时,她本想坐上行手扶电梯上楼,但错误地走到了下行电梯口。如果她直接迈步上前,很容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。

幸好拿在身前的盲杖帮了忙。杖尖试探到一级台阶后,立即被下行的力量推回。陈瑾随之倒退了一小步,她很快反应过来:自己找错了电梯。“好危险!”

那一天,直到坐上回学校的公交车,陈瑾才松开了盲杖。志愿者接过盲杖后发现,厚厚的海绵手柄早被陈瑾的汗水浸透了。

杨青风违规跑回家的事情把父母吓了一大跳,但自那以后,家中的“禁令”也逐渐松懈。因为能独立出行,2006年,大学主修针灸推拿专业的杨青风成为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的记者;2008年北京残奥会,他是唯一的视障注册记者。那个夏天,靠着盲杖引路,杨青风进出于各个残奥会场,每天向后方发回现场采访报道。通过网络,他还向全国的视障听众直播游泳、足球等赛事情况。

“我们可以是按摩师,也可以是记者,我们还可能是程序员、律师……”走出门的杨青风,获得了和健全人同样的可能性。

但像杨青风这样的视障人士太少了。过去,在他工作的一加一集团声波残联社会服务中心,很多员工也不

能自主出行。后来,招聘条件里特意加了一条:应聘者必须能独立上下班。

十几年来,杨青风不记得自己用坏了多少根盲杖,去了多少地方。走得越多,他就越想让更多视障者能融入这个世界。2018年初,“金盲杖视障奇葩成长营”在南京首次开营。至今,已有包括有人公益基金会、博世中国等组织和企业主动给予赞助。来到北京,已是此项活动的第5站。

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很乐意与“金盲杖”合作。此前为了鼓励视障学生融入社会,学院制定了加分等各种激励措施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这一次有“前辈”现身说法,学生们报名参加成长营的积极性显得很高。

开营仪式结束后,杨青风掏出手机,一面用手指滑动屏幕,一面把耳朵贴近听筒。“联系人,浏览器,日历……”手指所到之处,智能手机的无障碍辅助功能快速读出屏幕上的图标。在语音引导下,杨青风熟练地“摸”入微信页面,发出一条语音信息,“您好,逗号,开营仪式很顺利,逗号,谢谢您,句号。”

“如果上街就很‘怪’,那我们干的‘奇葩’事还多着呢。”王志华也扬了扬自己的手机。这个曾参演电影《推拿》走过柏林电影节红毯的“视障圈名人”觉得,有科技助力,如今视障群体能做的事一点不比普通人少。



点亮灯

李翔要崩溃了。

这是训练营的第二天,营员们正在完成“商超大通关”任务。李翔抽到的任务之一,是找到位于商场5楼某家餐厅门前的电子体重秤,称重后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读取数据。

第一次,除了手中的盲杖,李翔没有任何依靠。

走着走着,他走偏了,拐进了一条断头路。“笃笃笃,笃笃笃……”手中的盲杖急促地点地,可李翔一直没有走出去。此时是下午3点多,餐饮区里很安静,他没有可求助的路人。

李翔停了下来,汗水一点点从他额头渗出,很快变成汗珠一颗颗划过脸庞。慢慢地,他在角落里蹲了下来。站在远处的志愿者既心疼又心急,却不能上前帮忙。一分钟,两分钟……就在志愿者以为他准备放弃的时候,李翔站起身,重新握紧了盲杖。

贴紧墙壁,用盲杖一点点敲击着前行,遇到阻碍就顺势拐弯,否则一直直行。用这个笨办法,李翔从断头路里走了出来。

就在这时,不远处响起了路人的脚步声。没有片刻犹豫,李翔大声说道:“你好,请问可以帮我一下吗?”当最终站上电子秤,李翔重重地喘了一口气。



我的眼

和李翔同岁的罗文聪非常理解那种绝望的心情。到北京领奖那次,即使有无比完备的计划,他还是遇到了问题,“本应该在北京站接我出站的工作人员把我忘了。”

这意味着罗文聪要自己想办法走出车厢、离开站台、经过拥挤的出站通道并找到地铁入口。这其中的每一项,对当时的他来说都有极高的难度。

即使是导师王志华,也有许多跌跌撞撞的时候。他曾经定期去一位声乐老师家上课。在那段路上,王志华撞翻过小贩的摊子,掉进过正在施工的土坑,还因躲避不及被汽车挂倒过。好几次抵达老师家,他都是一身泥,脸上还有摔伤留下的血迹。

“这些不应该成为阻碍视障者出行的因素。”杨青风说,自己曾在大街上给行人指过路,“健全人不也会迷路,也会摔跤吗?”

从北京回到青岛,在返回学校的出租车上,罗文聪突然改变主意,让司机把车停在了学校附近的理发店旁。

几乎每个月,罗文聪都会由人带着,来这家店理发。每一次,他都想自己“摸”着往返,可每一次,他都不敢。

那一天,抱着奖杯,手持盲杖,像是完成某种仪式一般,罗文聪自己从理发店走回了学校。

到特殊教育学院上大学这两年,罗文聪越走越上瘾。去年,参加“金盲杖”项目天津站活动后,他开始系统训练出行技巧,成为一名见习导师,并且收获了爱情——一位拥有明亮双眼的志愿者。现在,他练习出行的动力更多了,“我想像普通男孩一样,多去看看她。”

“我很羡慕他的自由。”营员温科信是罗文聪的室友,受其影响,温科信决定拿起盲杖参加培训。视障群体社交圈不大,学校里上下五届都互相认识,也相互影响。到目前为止,经“金盲杖”培训过的视障者有近70位。他们像70盏灯,点亮身边的黑暗,鼓励更多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。



我的眼

“你好。我要去清华大学西门,请问怎么走?”

开营第三天,营员们迎来了终极考核。李翔的任务,是到清华大学大门口,并拍下一张照片。在五道口的一个十字路口,他停下来向旁边停车场的收费员问路。经过前几天的训练,李翔用起盲杖来熟练了不少,也能够毫不畏惧地开口求助了。

停车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要给李翔领路。他快步走到李翔身边,架起他的胳膊就匆匆上了路。李翔能感觉到来人比自己矮了一头左右,走路轻快,却一直一声不吭。

走出没多远,领路人突然放慢速度,脚步变得有些犹豫,李翔意识到,他可能也不清楚目的地的具体位

置。这时,领路人拦下迎面走来的一名行人,他想问路,但张开嘴却只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

领路人摇了摇李翔的胳膊,李翔这才反应过来,自己身边站着的是一位聋哑人。他马上开口,向行人询问方向。

就这样,李翔的嘴巴配合着领路人的眼睛,两人合力朝前挺进。直到把李翔送出1公里多,那位聋哑人才与他告别原路返回。

类似的事情陈瑾也碰到过。到超市完成采购任务时,因为不了解区域分布,她一直犹豫着不敢迈步转弯。突然,她听到拐杖点地的声音,“小姑娘,你想买什么?”听声音是一位老爷爷。

“我想买面包,您知道在哪儿吗?”

“在那边。”老爷爷抬起胳膊指向右前方,见陈瑾没反应,他才意识到自己“犯了错”。

“我要买酱油,咱俩挽着走吧。”老爷爷主动提出,“我腿脚不方便,这样一来,你是我的腿,我是你的眼。”

“改变,不只是我”,这是印在成长营营服背面的一句话。开营之后,每当营员们集体出行,都会引来不少路人驻足关注。虽然有极少数人质疑这是作秀,但更多的时候,这些头一次走进真实世界的视障者感受到的,是理解与善意。

离开领路的聋哑人不久,一位碰巧经过的中年男子又主动“接力”,要送李翔到目的地。因为曾参与过与视障者一起跑步的活动,男子颇有经验地挽着李翔的胳膊。两人走得很快,一边走还一边聊起了家常。从背后看过去,就像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父子在周末出门散步。

前后花了4小时,李翔终于抵达清华大学西门。“如果没有沿途帮忙的人,我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。”

不过有的时候,不适当的帮忙也会带来麻烦。有一次,王志华急匆匆地要去火车站,在地铁口问路时被工作人员“扣”了下来。“他说按照标准化服务,必须由一名站站长带着我从直梯通行。”王志华哭笑不得,乘坐扶梯对他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。这一折腾,整整耽误了他40分钟的时间。

一天带营员外出训练时,杨青风不留神被路口的阻车桩绊了一下,一位相向而行的路人一个箭步冲上去,双手抓住他的胳膊。

“谢谢,我没事!”杨青风快速挣脱了。路人的手悬在半空,面露一丝尴尬。“这显得有些近人情,但随意伸手反而可能把毫无准备的视障者拽倒。”事后杨青风解释说,正确的助盲方法应该是先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,得到肯定答复后再出手。

作为声波残联社会服务中心唯一的健全员工,余素一已经和视障群体共事了4年多。现在,他的爱好之一是向身边的朋友“科普”与视障者相处的方法,介绍视障者不可思议的能力。“通过我,健全人也会了解到,视障者的世界其实没什么不同。”

营员们第一次走出校园时,在盲道上排成长长的一列,突然前方响起了稚嫩的女声。

“妈妈!他们拿的是什么呀?”

“那叫盲杖,是帮助走路用的。”

“真好!我们也买一支吧!”

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罗文聪正和年轻的妈妈擦身而过,听到这儿,他们俩都忍不住笑哭了。



上红毯

5月27日下午,闭营仪式即将举行。屋子中央铺着一条简单的红毯,12位营员要手持盲杖,经过这段红毯,领取自己的结业证书。杨青风还为营员们准备了寄语:当你拿起盲杖,生活中到处都是为你铺就的红毯。

在成长营里,楼林昊天几乎总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。即使是最简单的排队走路,他也会掉在最后面,被前面的营员落下一大截。

楼林昊天在和自己的恐惧斗争着。一出门,他就急切地要寻找盲道。遇到盲道中断或突然直角转弯的时候,楼林昊天都会紧张地停住脚步。有时候他的脚悬在半空,经过盲杖反复试探确定安全后,才会慢慢落下。足能能感受到盲道上凸起的纹路,是他必须抓牢的安全感。

“4天的时间不可能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。”开营那天王志华就说,“金盲杖”可以帮助营员们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,“但未来的每一步,都要靠你们自己。”

闭营仪式的红毯上设有盲道,短短一段路,楼林昊天也会走偏。时不时,他的盲杖会撞上两侧的桌椅。他并不慌乱,顿一顿,调整路线继续前行,步伐缓慢但坚定。

此前的开营仪式上,楼林昊天是领誓人。宣誓前,他反复用手搓着一张棕黄色的盲文纸,为的是能流利带领所有营员宣誓:“最大限度独立出行,最小限度请求志愿者帮助,为独立出行、为获得独立自主的生活、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尽最大努力。”

当结业徽章终于戴在胸前,楼林昊天似乎对誓词有了新的理解,“真正的独立,不是拒绝帮助,而是要有一颗独立的心。”

盲杖笃笃,楼林昊天和其他人一起,从这个初夏起步,迈向属于自己人生的红毯之路。

(本版照片除注明外均为本报记者张千、杨兆敏摄。)

编后

杨青风、王志华们克服视力上的残联融入社会,在他们的影响下,或许会有更多的视障者愿意走出家门。他们的勇气让其他人感动,其他人的理解和帮助又让他们对独立出行更有信心。

只是,在成长营期间,营员们时不时与盲道上的障碍物撞个满怀的现象却提醒着:当视障群体奋力向世界奔跑时,世界是否应以更温柔的姿态迎接他们?

完善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,让已有设施发挥应有的作用,最大限度降低残疾人出行阻碍。这样做,既是本应为残疾人提供的便利,也是当代社会温度与文明程度的彰显。



导师王志华带领营员们持“剑”上路。



在商场,工作人员协助营员感受智能家电。



一辆横在盲道上的单车挡住了营员的去路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
请扫二维码